

明代古文润笔的价格波动及其影响因素

时鹏飞

内容提要 明代润笔的价格波动，有其市场规律。明初润笔价格较低，顶尖文人也只有百两左右。一般翰林文人的润笔，直到景泰年间尚不过二三钱。夺门之变前后，价格上涨到五钱一两。成化时涨到二两。到正德时，价格更翻了十倍。嘉靖年间，阁臣的润笔可达一二百两。万历时期涨至顶峰，即使是普通翰林文人，百两已司空见惯，顶尖文人甚至可达千两。天启年间，价格开始回落，下降了一半左右。但因基数较高，直到清初仍维持在较高水平。此外，地域差异、买家财力、文章内容等因素也会影响润笔价格。

关键词 润笔 价格 商品化 古文

润笔是文人经济生活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话题。作为文化商品的报酬，润笔的价格需要遵从市场规律。明代的物价，“大致呈价格日渐上涨的趋势”^①，但不同商品涨幅差别很大^②，故而难以通过其他商品的价格波动推估润笔的行情变化。同时因为儒家“罕言利”的传统，文人很少公开谈论润笔的数目，这也使考察润笔价格波动变得更加困难。本文试图整合明代文献中的零散记载，根据不同时期翰林文人的润笔价格勾勒明代润笔的整体波动走势，同时根据顶尖文人和底层文人的报酬情况，探索润笔价格的上下限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请人作文是求文者与作者之间的交际行为，当求文者与作者关系足够亲密或存在人情往来时，作者可能只收很少的润笔，或者干脆不收润笔。这时求文者付出的主要是人情成本，而不是经济成本，也就不能用一般的价格行情去衡量，故而本文讨论之时避免使用过多掺杂人情因素的例证。

关于元末明初润笔的记载不多，不过润笔现象是普遍存在的。宋濂所撰杨维禎墓志载“无赖之徒伪为君文以冒受金缗，或疑以为问，将发其奸，君曰‘此诚予所作也。’”^③倘若没有收取润笔的社会风气，冒名顶替恐怕很难成功。刘三吾撰《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》《东川侯胡公海墓志石》，丧家就曾“侑以币端”^④“遣人致礼币”^⑤。成书于永乐年间的小说集《剪灯余话》中的《泰山御史传》包含这样一段情节“近又被墓灵冢百诉其生前撰述死者铭志不实，广受润笔之资，多为过情之誉，以贞乱贗，以愚为贤，使善恶混淆。冥官最所深恶，往往照依绮语妄言律科罪，付拔舌地狱施行。”^⑥小说

① 陈宝良《明代的物价波动与消费支出》，《浙江学刊》2016年第2期。

② 参见高寿仙《明代北京三种物价资料的整理与分析》，中国明史学会编《明史研究》第9辑，黄山书社2005年版。

③ 宋濂著，黄灵庚编辑校点《宋濂全集》卷五八《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3册，第1354页。

④ 刘三吾著，陈冠梅校点《刘三吾集·刘坦斋先生文集》卷一〇《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58页。

⑤ 《刘三吾集·刘坦斋先生文集》卷一一《东川侯胡公海墓志石》，第171页。

⑥ 李昌祺《剪灯余话》卷八，《古本小说丛刊》第五辑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1册，第117页。

固然出于虚构，但若没有收受润笔的风气，这一情节也是无法凭空杜撰的。唐宋以来，作文取酬已成惯例，很难想象求文者会空手而来，而作文者也一无所求，故而有的学者主张“15世纪初叶润笔甚至还不普遍流行”^①，“明初士夫为人作文绘画，取酬的现象并不普遍”^②，恐怕并非事实。至于明初润笔的数目，郑楷所撰宋濂行状载“日本使奉敕请文，以百金为献，先生却不受。”^③郑是宋的门人，所记应当可信。宋濂的另一笔收入见《题王羲之真迹后》：“昔年危内翰太朴出示羲之《野凫帖》，且云别有《喜色帖》在江右……濂恨未之见。近豫章人士来求墓文，忽持此帖为贖。”^④明初王羲之真迹的价格尚不清楚，不过几组数字可资参考：定武本《兰亭序》，明初胡翰跋称“陈真人欲售白金百两”；至嘉、万年间，项元汴跋云“其值肆百念金”^⑤，涨幅为320%，同时期王羲之的《婚书》（十五字）、《快雪时晴帖》（二十四字）均以三百两成交^⑥，由此推测当时《喜色帖》的价格当也在百两左右。宋濂号称“当今文章第一”^⑦，“海内求文者，项背相望”^⑧，但是较之宋代文人润笔动辄数百两，仍相差甚远，这与明初社会生产刚刚恢复，物价水平比较低有关。

洪武八年（1375）开始推行大明宝钞，“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、银一两”，并且一度“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”^⑨。受此影响，洪、永时期罕见润笔以银计价的记载。宝钞颁行后迅速贬值，宣德五年（1430）杨士奇奉命草敕，“敕谕既下，上闻众心忧戴，召臣赐钞三千缗，文绮二端，及羊酒。臣叩首受赐。上笑曰‘薄用润笔耳。’”^⑩若按宣德七年（1432）官方银一两折钞一百贯的兑换比，合银三十两。然而民间实际贬值更严重，正统元年（1436）户部尚书黄福奏称“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”^⑪，依此折算就很微薄了。不过赏赐性质特殊，不尽同于一般润笔。

至于普通翰林文人的润笔价格，景泰八年（1457）夺门之变前后曾大幅上涨，叶盛《水东日记》载“三五年前，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，润笔银二三钱可求，事变后文价顿高，非五钱一两不敢请。”^⑫天顺至成化，价格又翻了一番，涨到二两。成化至正德，更翻了十倍以上，涨到二十两，有时甚至四五十两。《山樵暇语》载：

刘教《正思斋杂记》云：“……成化间，则闻送行文求翰林者，非二两者不敢求，比前又增一倍矣。则当初士风之廉可知。”正德间，江南富族著姓，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，润笔银动数廿两，甚至四五十两，与成化年大不同矣。（俞弁《山樵暇语》卷九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齐鲁书社1995年版，子部第152册，第68页）

关于嘉靖初的润笔价格，《万历野获编》载“余读杨文襄石淙（引者按：指杨一清）所为司礼太监张永墓志……乃张萝峰（引者按：指张璁）谮杨，受永弟容赂黄金二百两，因而谀墓，遂追所受润

① 余英时《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》，《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》，《余英时文集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卷，第172页。

② 彭勇《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试析》，《史林》2003年第2期。

③ 郑楷《翰林学士承旨宋公行状》，程敏政《皇明文衡》卷六二，《四部丛刊》本，第23b叶。

④ 《宋濂全集》卷三七《题王羲之真迹后》，第2册，第810页。

⑤ 王杰等《钦定石渠宝笈续编》，《故宫珍本丛刊》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444册，第434页。

⑥ 参见叶康宁《风雅之好——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》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，第183页。

⑦ 《宋濂全集》卷四三《跋张孟兼文稿序后》，第2册，第957页。

⑧ 刘基著，林家骊点校《刘伯温集》卷二《宋景濂学士文集序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，上册，第124页。

⑨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九八，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，第1669—1670页。

⑩ 杨士奇著，刘伯涵、朱海点校《东里文集·圣谕录》卷下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411页。

⑪ 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一五，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，第293页。

⑫ 叶盛《水东日记》卷一“翰林文字润笔”条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3页。

笔。”^①“黄金二百两”数目过于惊人，《杨文襄公事略》载“詹事霍韬毁公于朝，谓永暴卒，公为作墓志铭，受银二百两”^②，《弇山堂别集》亦谓“容求文所遗银二百两”^③。数字看似合理，实则三书皆误。霍韬奏疏曰：

永馈璫金千两、银二千两，璫叱出之。既而闻杨一清等皆受纳矣……太监萧敬死，馈杨一清等银二百两、绉丝二十表里，假曰求作墓志也，实则先啖以利，而后大有所求也。所馈银币独璫斥出，不受。（霍韬《渭厓文集》卷三《国是疏》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二辑，黄山书社2016年版，第25册，第363页）

张璫上疏认可霍氏所说，并云“萧敬死后，其家果亦曾托求墓志，送银一百两、段二十匹。”^④“金千两、银二千两”乃是张永生前贿赂张璫的数目，所涉墓志则是为萧敬而作。大概因为霍疏两事同奏，后人因而牵合误作一事。据此可知首辅杨一清的润笔是二百两、二十匹布，次辅张璫则是一百两、二十匹布。

嘉靖至万历润笔价格继续上涨，最终出现笔者所见明代最高价。黄宗羲《明文海》评语“弇州史笔多出自私心……至如吾邑吕相，得其润笔千金，不难得其竭力回护。”^⑤“吕相”即吕本。黄氏是大史学家，黄、吕二家又是同乡世交^⑥，立言当有所本。这笔交易买方是宰相家，卖方是“操文章之柄，登坛设埴，近古未有”^⑦的王世贞，而润笔的行情是“币益重，言益甘，下笔愈多溢美”^⑧，若非价格奇高，不至如此谀墓，各种因素共同造就了这一高价。这是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王氏晚年的例子。王氏跋赵孟頫《济禅师塔铭》云“千八百骊珠入我囊中，月来卖文钱为之一洗。”^⑨有学者据此认为“千八百骊珠”是其一月的收入^⑩，此说非是。“千八百骊珠”谓此帖千八百字，苏轼诗“袖有骊珠三十四”，自注“臣所赐诗并题目及臣姓名，凡三十四字”。按当时赵孟頫书法的行情，至少价值数十两。这是王氏较早时的收入水平。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王世懋去世，汪道昆受聘撰碑，王世贞致书云“犹子所上器币，比之元微之家贄白少傅，不能十一。”^⑪白居易撰元稹墓志，“价当六七十万”，此云“不能十一”，则不足六七万（合银六七十两）。

至于这一时期翰林文人的润笔，百两已司空见惯，较正德年间又翻了一番。袁中道《师友见闻语》载“伯修居宦，予每从之宦邸……见其却百金者屡屡。”^⑫伯修即袁宗道，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进士，随后任职翰林院直至去世，故可用来代表翰林文人的润笔价格。一般文人有时也能达到这个数字，冯时可《润笔记》云“古者乞文，一字一绢，或一字一金，而余所得不过数十缗。”文末冯大咸

① 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六“内官张永志铭”条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164页。

② 朱淳《重葺杨文襄公事略》，赵藩、陈荣昌等辑《云南丛书》二编，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云南丛书处刻本，第32b叶。

③ 王世贞撰，魏连科点校《弇山堂别集》卷一〇〇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4册，第1894页。

④ 张璫《谕对录》卷一一，明刻本，第17a页。

⑤ 黄宗羲编《明文海》卷四八〇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5册，第5173页。

⑥ 黄宗羲著，吴光主编《黄宗羲全集·南雷诗文集》传状类《黄醒泉府君传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9册，第231页。

⑦ 钱谦益撰集，许逸民、林淑敏点校《列朝诗集》丁集卷六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8册，第4453页。

⑧ 陈祖范《司业文集》卷三《卖文说》，清刻本，第22b叶。

⑨ 王世贞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卷一三一《赵文敏书济禅师塔铭》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三辑，黄山书社2016年版，第35册，第162页。

⑩ 参见黄朋《吴门具眼：明代苏州书画鉴藏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236页。

⑪ 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续稿》卷一八五《汪司马》其二十九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三辑，第39册，第250页。

⑫ 袁中道《珂雪斋集》外集卷一二《师友见闻语》，明万历年间刻本，第1a叶。

跋云“近有贵宦没，其子以百缗请，固谢弗承。”^①

明代润笔价格持续上涨，在万历时达到顶峰，而在天启年间开始下降。薛冈《报陈公吁参戎》云“今都门润笔之资，较昔时十不得五。”^②此文又云“寒家十数世以来诗文集……合刻小集，名曰《世风删》，序之者则先司马恭敏公与今大宗伯公也。”该书天一阁有藏，卷首有薛三才、薛三省序，后者天启五年（1625）除礼部尚书，同年罢。此文称“今大宗伯公”，可知即作于是年。不过润笔价格虽有所下降，但因为基数很高，故而价位仍然不低，侯方域记其友人吴伯胤“少年时就燕京廷对，猝遇老中贵，延请置之上坐，求为作《兔山》、《五龙亭》、《梳妆楼》诸记，天坛《迎神》诸歌。既毕，酬之金五百缗”^③。至于明末清初顶尖文人润笔的价格，黄宗羲《思旧录》“钱谦益”条载：

甲辰，余至，值公病革……公言顾盐台求文三篇，润笔千金，亦尝使人代草，不合我意，固知非兄不可。余欲稍迟，公不可，即导余入书室，反锁于外。三文，一《顾云华封翁墓志》，一《云华诗序》，一《庄子注序》。（《黄宗羲全集·思旧录》“钱谦益”条，第1册，第342页）而钱氏致书陈式时则说“彼时润笔殊可观，今日则恰与枯肠相称”^④，可知其先前的润笔价格还要更高一些。

很多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润笔价格。首先，作者地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方孝孺说“世之风俗漓薄，视今之文，未论其工拙，先舒纸尾，览官位爵秩。故求文章者，必于穹位隆爵之人。”^⑤官品高低通常直接影响润笔多少，陈豫请首辅杨士奇撰文遭拒，随即“减金币三分之一”^⑥，转聘次辅杨荣。与上层文人润笔动辄数十百两不同，底层文人的润笔几乎微薄到寒酸的地步。活动于万历年间的姚旅说“今为亲上寿，率十数金为锦幛，然惜重币求文，只持数钱，索学究笔，借一显贵姓名，以夸耀戚里。”^⑦大约同时的陈昂，“为人佣作诗文。其巷中人，有小小庆吊，持百钱斗米与之，辄随所求以应”^⑧，这还是润笔行情最好的时期。而且，即使要价如此低廉，仍免不了受人白眼，“无位之人不当轻与人作文，徒为人嫌”^⑨。其次是地区差异，发达地区买家众多、财力雄厚，文人不难赚取丰厚的润笔，所谓“据纷华之地，而多卖文之钱”^⑩。其中首推京师，文价比南京还高出一大截，梅鼎祚致书吕胤昌“欲来南都卖文为活，而南中文价贱，视燕中天壤。”^⑪偏远地区罕有买家，即便偶有求文，也多是“村翁寒儒”，润笔自然不会丰厚，汤显祖云“通都要区，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……弟既名位沮落，复住

① 冯时可《冯元成选集》卷一九《润笔记》，明刻本，第60a—60b叶。

② 薛冈《天爵堂文集》卷一七《报陈公吁参戎》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五辑，黄山书社2016年版，第33册，第210页。

③ 侯方域著，王树林校笺《侯方域全集校笺》卷九《书吴延仲集后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中册，第510页。

④ 钱谦益著，钱曾笺注，钱仲联标校《牧斋杂著·钱牧斋先生尺牘》卷二《与陈金如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，上册，第292页。

⑤ 方孝孺著，徐光大点校《方孝孺集》卷一一《答俞景文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，中册，第418页。

⑥ 李贤《古穰集》卷三〇《杂录》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一辑，黄山书社2016年版，第41册，第313页。

⑦ 姚旅《露书》卷九，明刻本，第87b页。

⑧ 锤惺著，李先耕、崔重庆标校《隐秀轩集》卷二二《白云先生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419—420页。

⑨ 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五〇“闹几场骂不休”条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530页。

⑩ 李开先著，卜键笺校《李开先全集·李中麓闲居集》（修订本）卷一〇《李崆峒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，中册，第931页。

⑪ 梅鼎祚《鹿裘石室集》文集卷一〇《与吕玉绳》其三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四辑，黄山书社2016年版，第23册，第226页。

临樊僻绝之路。间求文字者，多村翁寒儒小墓铭时义序耳。”^① 再次，买家财力也是重要因素。达官贵人请人作文时固然出手阔绰，而宦官与商人为清流所轻视，聘人撰文就更不惜重金，“当世贵人，及大珰、藩邸，不爱重赏厚币”^②。最后，文章内容也会影响润笔价格，求文者大多希望文章谄媚溢美，“称述稍简严，弗务推极于崇深，其子弟犹不平见颜色”^③。而要文人如此照办，就必须提高润笔价格，最终形成“高下视贿”的局面，报酬不够丰厚，文人行文之间甚至可能暗含讥讽，“以润笔未厚……而隐语含刺”^④。

我们由以上问题延伸，还可以谈一谈文学商品化的问题。单看润笔价格，明代并不突出，然而笔者以为商品化的程度并不在于价格的高低，而应当看商品化写作的普遍度。试以墓志为例，唐代墓志作者中，父祖、兄弟、丈夫、子孙、女婿、叔侄、舅甥这些亲属关系占到 44.61%^⑤。明代墓志目前尚无全面整理的成果，笔者统计了《新中国出土墓志》等著作中 1869 方明代墓志，除去不署名或署名残泐的 211 方，上述近亲撰文仅 172 方，占比降至 10.37%。“近今作志皆借搢绅”^⑥，请托非亲的士绅一般都要付给报酬，这就说明明代商品化写作的普遍度较之前代要高很多，文学商品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。

[作者简介] 时鹏飞，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。发表过论文《孤本〈皇明修文备史〉流传及撰人考略》等。

(责任编辑 马 昕)

① 汤显祖著，徐朔方笺校《汤显祖集全编》诗文卷四七《答张梦泽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，第 4 册，第 1925 页。

② 陈懿典《陈学士先生初集》卷六《寿孙心湖七十叙》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四辑，第 76 册，第 211 页。

③ 王世懋《王奉常集》卷二〇《封奉政大夫广信府同知林公暨元妃封太宜人黄氏合葬墓志铭》，《明别集丛刊》第三辑，第 73 册，第 402 页。

④ 方弘静《千一录》卷一三，明刻本，第 13b 叶。

⑤ 参见江波《唐代墓志撰书人及相关文化问题研究》，吉林大学 2010 年博士论文，第 90 页。

⑥ 王贍《于弘道墓志》，中国文物研究所、河南文物研究所编《新中国出土墓志·河南（壹）》，文物出版社 1994 年版，下册，第 38 页。